

20世纪50年代郭沫若史学观念中的史论关系*

李 勇

【提要】 20世纪50年代,中国大陆史学界一方面批判实验主义方法,另一方面开展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学习运动。这使得郭沫若史学中实验主义和唯物史观之间的紧张随之突显。在理论上,郭沫若主张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实践上,他主张以史料使用情况来衡量史学论著学术水平的高低。其史论关系说是60年代初史学界纠偏的先声。

【关键词】 郭沫若 胡适 实验主义 唯物史观

20世纪50年代,中国大陆史学界一方面批判实验主义方法,另一方面开展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学习活动。这原本是一场针对学术界的思想改造运动,对于马克思主义占据史学主导地位起到重要作用。然而,如何把握尺度和拿捏边界,确很困难。这既是史学界面临的共同问题,更是那时作为史学界带头人的郭沫若无法回避的难题。对于该时期的郭沫若史学研究,以往学界或论述其具体的历史著作、历史剧的写作,^①或探讨其身处思想改造、批判运动时在学术与政治之间的挣扎。^②这些探索非常可贵。但是,造成史论关系紧张的学理缘由是什么?为什么批判实验主义会突出郭沫若史学中实验主义与唯物史观之间的紧张关系?郭沫若又是怎样在史与论两极之间寻求平衡的?对于这些问题,现有研究未曾揭示,本文拟就这些问题展开讨论。

一、批判实验主义引发史论关系的紧张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史学界开展思想改造运动,这场运动从“破”的角度说是批判以胡适为代表的实验主义,从“立”的角度看则是开展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学习活动。1955年5月6日,郭沫若给钱祖夫写信,明示二者的关系,他说“批判胡适,主要目的在宣扬并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因有立必有破,从批判反动思想中更容易接受正确的真理。”^③

马克思主义者针对实验主义的批判活动,始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并一直延续到50年代初。不过,大规模有组织的系统批判,是在1954年10月展开的。对于这一批判活动,第一代马克思主义

*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郭沫若史学的命运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研究”(项目编号:18BZS007)的阶段性成果。

① 参见叶桂生、谢保成《郭沫若的史学生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谢保成《郭沫若学术思想评传》,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版;何刚、王海涛《郭沫若文艺与史学思想新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② 参见王维江《五十年代历史学家的命运》,《炎黄春秋》2009年第6期;何刚《是“征服者”,还是真学者?——就20世纪50年代的郭沫若与王维江先生商榷》,《学术探索》2010年第1期;贾振勇《郭沫若与20世纪50年代思想改造、批判运动》,郭沫若纪念馆等编《中国社会科学论坛文集——郭沫若与文化中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

③ 黄净浩编《郭沫若书信集》下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14页。

史学家都公开发文、积极参与^①，其他史学家也异常踊跃。^②正如吕振羽在《六年来的新中国的历史科学》中所总结的那样“史学工作者积极地参加了这个斗争，写了许多有关文学史、哲学史以及其他有关历史科学和考古的批判论文。我们举办了多次胡适思想批判的学术会议，从各方面来批判胡适派的反动观点和反科学的‘历史方法’。”^③

这场批判胡适的运动是中央指示和国家行为，这在 20 世纪 50 年代中国社会转向社会主义期间的确有其必要性。但是，在实践中因难以拿捏尺度和边界，结果又存在着扩大化趋势，主要表现为：从否定胡适政治思想扩大到否定胡适的一切，从否定胡适实验主义考据学扩大到否定一切历史考据，从批判胡适到批判一切与胡适有密切关系者。这些扩大化现象是教条主义和极“左”的表现，当时就有人这样认为。1952 年 8 月 3 日，祝瑞开给顾颉刚的信中说“考据陷入支离破碎的范围内，固然于事无补，脱离实际（所需批判者即在此），但是在根本上若无真实可靠的史料，单凭一些概念，即生硬的粗糙的解决历史上问题，此即违反马列主义。读毛主席《矛盾论》对一些教条主义的批判，我深感以往与目前历史界就有这种现象，特未被指出耳。我们这一治学精神并未违反马列主义。”^④

另外，据 1953 年 6 月 21 日顾颉刚日记，时为中共党员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李平心有言“现在哪里是马列主义，直是形式主义。”顾氏评论道“平心则共产党人，惟因有学问，不能盲从耳。”^⑤胡适史学被批判，引发顾颉刚和《古史辨》被批判，对此顾颉刚明显流露消极情绪。1955 年 3 月 5 日，其日记写道“近来批判胡适历史学、考据学的文字中，常常牵到我和《古史辨》……予老老实实研究学问，虽不能把握马列主义，究与胡适不同，而一般人乃比而同之，是予所不愿受也。”^⑥1955 年 7 月 16 日日日记又载“读《历史研究》中范文澜、蔡美彪、梁从诫三文，渠等批判胡适，均联及余，为之不快。”^⑦那时非马克思主义阵营从事考史的史学家有顾颉刚这种情绪者当不是个别现象。这类现象表明，批判胡适的实验主义方法本来是一场正常的学术活动，但出现一种偏差：对正当的重视史料的史学主张和论著也加以批判。这样，就引起中国大陆史学界关于史料与理论孰重孰轻的激烈争论。可以说，史论关系的讨论是批判实验主义和学习马克思主义这场运动的并发症，也可以说是自然的结果。对此，吕振羽说“‘论’就是观点，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史’就是史料。‘史’和‘论’的统一，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通过对具体历史进行具体分析，揭示出历史发展的规律性。”^⑧

20 世纪 50 年代，学术界争论的结果是，主张重视史料者遭受进一步的批判。正如苏双碧所反思

① 例如，范文澜发表的《看看胡适的“历史的态度”和“科学的方法”》（《历史研究》1955 年第 3 期），吕振羽撰写的《胡适派主观唯心主义历史观批判》（《科学通报》1955 年第 5 期），侯外庐出版的《胡适的反动政治思想》（湖北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版）。而翦伯赞早在民国时期就积极批判胡适的实验主义，他的《历史哲学教程》（生活书店 1938 年版）、《中国历史科学中的实验主义》（《读书月报》第 2 卷第 3 期，1940 年 5 月）、《略论中国史研究》（《学习生活》第 4 卷第 5 期，1943 年 5 月）都批判了实验主义。其中，文风书局在 1946 年出版的《中国史论集》第 1 辑中收录了《中国历史科学中的实验主义》一文，将题目改为《评实验主义的中国历史观》。

② 参见胡尚元的《胡适思想批判运动及其消极影响——史学领域的一个视角》（《安徽大学学报》2005 年第 3 期）以及胡晓的《胡适思想批判运动述评》（《安徽史学》2009 年第 6 期）。

③ 吕振羽《吕振羽全集》第 8 卷，人民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418 页。

④ 顾颉刚《顾颉刚书信集》第 3 卷，中华书局 2011 年版，第 371 页。

⑤ 顾颉刚《顾颉刚日记》第 7 卷，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2007 年版，第 405 页。

⑥ 顾颉刚《顾颉刚日记》第 7 卷，第 663 页。

⑦ 顾颉刚《顾颉刚日记》第 7 卷，第 714 页。

⑧ 吕振羽《怎样学习历史》，《历史教学》1961 年第 10 期。

的那样“史和论的关系五十年代在史学领域里是一个带有根本性问题的争论……史料即史学的观点和方法根深蒂固,很难消除。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又不是很快就能掌握的,况且有关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科学的基本论述理解也很难全面、准确……就酿成后来在史论关系上的大争论和大批判,即正当的重视史料的,或主张史料即史学的统统当成资产阶级史学批判,而这种批判的武器,即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又是被简单化理解的或歪曲了的,这就造成了对我国历史科学发展的一次大破坏。”^①

就当时而言,史学界存在一个疑虑:批判重视史料是否意味着历史研究者就不可以从事史料的搜集和考证?其实,从根本上说,任何一位严肃的史学家,都不会否认史料的重要性。例如,1940年5月,吕振羽撰写《本国史研究提纲》指出“在今日,进行本国史研究,在史料方面,便不只是搜集和选择,还同时要从事整理考证的工作。”^②即使在批判胡适的年代里,范文澜仍然强调“研究历史,首先要把远古以来社会发展的整个过程画出一个基本的轮廓来,这必须依靠足够的资料……成为科学的历史,首先要求所用资料的明确性和具体性。在这样的基础上,正确的分析和正确的总结历史事件才有可能,也才有可能引导读者从历史的学习中走向马克思主义的认识。”^③

问题在于,一旦重视史料跟胡适实验主义发生意象关联,就可能被视作不重视理论;而不重视理论就可以被推论为反对唯物史观。最后,大家都用同一个腔调,那就是史料很重要,但必须要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整理和解读史料。说者借此以确保政治安全,而事实上人们却害怕一旦从事史料考证工作就会被视为不重理论。郭沫若同样处于这样一种困局中。

二、批判实验主义给郭沫若史学带来压力

郭沫若史学在方法论层面兼有实验主义和唯物史观。^④他持有怀疑态度,强调史料重要,慎言夏代史事,曾经否认井田制,且因发现新证据而不断修正自己的意见。在这些方面,他的做法与胡适的实验主义方法毫无二致。具体而言,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主张怀疑的态度。1921年,胡适在《“研究国故”的方法》一文中宣称“宁可疑而错,不可信而错。”^⑤1936年5月22日,郭沫若在给金祖同《甲骨文辩证》撰写的序中有一段有意思的文字。他说“怀疑辨伪乃为学之基阶,为学与失之过信,宁取其多疑;子舆云‘尽信书不如无书’,此终古不刊之论也。”^⑥这里的“失之过信,宁取其多疑”与胡适的“宁可疑而错,不可信而错”,有着惊人的相似。可以说,在提倡怀疑这点上,郭沫若与胡适完全无异。

二是强调史料的重要性。1928年,胡适谈到治学时说“科学的方法,说来其实很简单,只不过

① 苏双碧《史料和理论关系讨论的历史背景——关于史料和理论关系的再探讨之一》,《开放时代》1988年第3期。

② 吕振羽《本国史研究提纲》上,《读书月报》第2卷第4期,1940年6月。

③ 范文澜《保护历史文物的意义》,《文物参考资料》1954年第4期。

④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历史研究方法论有技术性方法和导向性(思想)方法。就技术性方法而言,像史料搜集与整理,包括校勘、辨伪等,无论是传统史学还是新史学都是通用的,也可以称之为实证方法。新文化运动后,这些方法的最时尚、最典型的表述就是实验主义。当然,实验主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本文所谓实验主义是狭义上的,即对技术性方法的特定时代的称呼。简言之,其要义就是怀疑态度、靠证据说话。

⑤ 胡适《研究国故的方法》,《东方杂志》第18卷第16号,1921年8月。

⑥ 郭沫若《〈甲骨文辩证〉序》,《说文月刊》第2卷第6、7期合刊,1936年10月。

‘尊重事实 尊重证据’。”“史家若没有史料 便没有历史。”^①1946年 他又说 “‘有几分证据 说几分话。’有五分证据 只可说五分的话 有十分证据 才可说十分的话。”^②在这个问题上 郭沫若与胡适也没有差别。1942年 他就说过 “我们要把一切真实的史料搜集起来。若是没有材料而谈社会史 简直是笑话。”^③1954年 他又说 “欲研究中国古史 非先事资料之整理 即无从下手。”^④

三是慎言夏代史事。胡适认为夏、商史事证据不足 信史只能从周开始。他说 “大概我的古史观是：现在先把古史缩短二三十年 从《诗三百篇》做起。”^⑤因此 他的《中国哲学史》空白夏、商而直接从孔子写起。因为没有证据 故对于夏代历史要存疑 在这一点上 郭沫若与胡适看法也是一致的。他研究中国古代社会从商代做起 在《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中明言 “夏代渺茫得很 我们现在还不好多谈。”^⑥1952年 他写《奴隶制时代》时 坚持说 “关于夏代的情形 我们今天还不能够多说 且等待日后从地底下能有丰富的资料出现。”^⑦后来在《中国古代史的分期问题》中 他还说 “殷代以前的夏代 尚有待于地下发掘物的确切证明。”^⑧

四是最初否认井田制。胡适否定井田制说 “战国以前从来没有人提及古代的井田制……没有证据证明井田制的存在。”^⑨郭沫若最初也否定井田制 他说 “最好是拿事实来证明 便是周金中有不少赐土田或以土田为赔偿抵债的记录 我们这里却寻不出有井田制的丝毫的痕迹。”^⑩他们当时否定井田制的存在 其原因是找不到证据 从本质上说是默证的体现 同时也表明他们对证据的倚重。

当然 问题并不这么简单 随着整个学术的进步和他们个人治学的进展 其观点也在发生变化 胡适后来也承认夏、商历史 郭沫若承认夏代是奴隶社会 后来还承认井田制的存在。这个问题暂且不论。

正因为郭沫若史学观念中有浓厚的实验主义色彩 吕振羽提出了批评。关于殷代为“开幕期”，吕振羽认为资产阶级实验主义的史学家“固然一致认为中国社会系开始于有甲骨文字可征的殷代”，而“一些新兴的史学家 也一同在此种错误的影响之下 认中国社会从殷代开幕”。^⑪1940年 吕振羽又说：胡适、顾颉刚、钱玄同等人从实验主义出发 断定中国史的开幕时代是殷，“对中国新史学研究有相当贡献的郭沫若 也同样把中国史截去一长节 以文化发展到相当程度的殷代为‘开幕期’……这正是郭氏历史理论中之实验主义的成分在作祟。”^⑫这里 吕振羽直接点了郭沫若的名。关于殷代兄终弟及问题 吕振羽直接批评郭沫若说 “这已完全在追随着实验主义者 郭先生自己或者还不知道哩！”^⑬关于殷代畜牧业繁荣问题 吕振羽批评道 “把畜牧的繁荣这一现象固定化之实验主义的说

① 胡适《治学的方法与材料》，《新月》第1卷第9号，1928年11月。

② 胡适《胡适全集》第13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556页。

③ 郭沫若《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15页。

④ 郭沫若《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5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8页。

⑤ 顾颉刚等《古史辨》第1册，朴社1926年版，第22页。

⑥ 郭沫若《十批判书》，群益出版社1946年版，第10页。

⑦ 郭沫若《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3卷，第17页。

⑧ 郭沫若《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3卷，第3页。

⑨ 胡适《胡适全集》第1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392页。

⑩ 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新新出版社1930年版，第299页。

⑪ 吕振羽《吕振羽全集》第8卷，第264页。

⑫ 吕振羽《关于中国社会史的诸问题》，《理论与现实》第2卷第1期，1940年5月。

⑬ 吕振羽《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不二书店1936年版，第8页。

明,自不能不陷于这样不能解决的矛盾中……这在郭沫若也同样陷在这一不能解决的矛盾中。”^①关于井田制存在问题,吕振羽批评说“近中郭沫若也认为金文中无井田制的存在,无条件的又作了实验主义的追寻者。”^②关于殷周制度不同问题,吕振羽在1933年的《中国上古及中世经济史》中批评说“在我们的‘唯物论’历史学家的血液中的实验主义的成分……在西周和东周之际那一连续发展的进程中,反又认为是历史的一大变革期。”^③这又是不点名地批评了郭沫若的实验主义做法。

无论如何,胡适和郭沫若都强调证据的重要,所以前者研究《水经注》,一旦发现更好的版本,就主动推翻之前依据较差的版本得出的结论;后者也是这样,关于殷、周历史,一旦弄清《周易》《诗》的时代,就主动修改之前的意见。这都是信奉实验主义的学者在实践中的表现。正是由于在这些方面,郭沫若与胡适十分接近,因此,吕振羽批评郭沫若有些观点是实验主义的,且从以上所述来看,吕这样评价郭,是有一定道理的。

然而,郭沫若毕竟不同于胡适,从学理上说,二者的最大区别是:胡适主张“我们没有什么共同的历史观”^④郭沫若则说“没有唯物证论的观念,连‘国故’都不好让你轻谈。”^⑤他使用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解读中国古史,终于跟实验主义划界分野。从此,其史学中种下实验主义与唯物史观之间张力的种子。20世纪50年代,大陆学界批判以胡适为代表的实验主义史学观念,这对于早年认同实验主义治学方法,且一直使用实验主义作为技术性方法的郭沫若,不能不说是一种压力。

但是,以下四个方面的因素,化解了这一压力。第一,《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写出来的;第二,他一直在批判实验主义代表人物胡适的一些学术观点;第三,在批判实验主义、讨论史与论关系问题期间,郭沫若一直明确主张,若建设科学史学,光有史料是不够的,必须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第四,明确自己过去的琐碎考证是挑战胡适之流的。

郭沫若为1954重印《金文丛考》写了弁言,表明其挑战胡适之流的用心“我准备向搞旧学问的人挑战,特别是想向标榜‘整理国故’的胡适之流挑战……胡适之流代表着买办阶级的所谓‘学者’,在当年情况,更自不可一世”,“因此,我就要拿些他们所崇拜的‘东西’,来打这个狂妄的家伙。”同时又表明,他有一个担心,那就是这样考证金文可能陷入琐碎和枝节问题上去:“旧东西也是有它的麻醉性的,愈深入便愈沉沦……我自己也感觉着有这样的危险,觉得愈搞愈琐碎,陷入了枝节性的问题。”接着,他又说是毛泽东领导的人民革命救了自己“是时代拯救了我,是毛泽东主席所领导的人民革命拯救了我,使我临到了沉溺的危境,而没有遭遇到灭顶之灾。”^⑥他这样一正一反一转,最终实现一合,不仅为重印琐碎考释的《金文丛考》做好了舆论准备,并且在更大意义上为学术界既重理论又重史料做好了铺垫工作。

三、20世纪50年代郭沫若史学观念中的史论关系

在20世纪50年代批判考史的学术氛围中,郭沫若致信北京大学学生,论述史学基本任务,强

① 吕振羽《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第54页。

② 吕振羽《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第185页。

③ 吕振羽《吕振羽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8页。

④ 胡适《胡适全集》第13卷,第556页。

⑤ 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第299页。

⑥ 郭沫若《金文丛考》,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重印弁言”,第3—4、5页。

调“有了大量的资料,经过耐心地处理,从中揭发出历史的发展规律,这应该就是史学的基本任务。”^①说史学的基本任务是在精心处理史料基础上去发现规律,这一观点其实并不新鲜,新史学理论先驱者梁启超、李大钊就是这样主张的,甚至可以说这一主张差不多是实证主义影响下所有新史学家的共识。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九五四年新版引言”中说“研究历史,和研究任何学问一样,是不允许轻率从事的。掌握正确的科学的历史观点非常必要,这是先决问题。”^②1954年1月,他为《历史研究》写发刊词,重申《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关于历史研究的主张,提倡用科学的历史观点研究和解释历史,强调“这就是我们所遵守的原则”。^③1959年3月21日,他撰写《关于目前历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答〈新建设〉编辑部问》一文,指出“研究历史的目的,是要用大量的史料来具体阐明社会发展的规律。今天我们很幸运,研究历史有了极重要的方便条件,因为社会发展规律,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的序中已很扼要地说明了。”^④

郭沫若这样说,并非否定史料的重要。1953年,他为《中国古代社会研究》1954年新版所写的“引言”中说“假使没有丰富的正确的材料,材料的时代性不明确,那也得不出正确的结论。”^⑤1954年1月2日,为《历史研究》写发刊词,他说“只要能够‘根据详细的材料加以具体的分析’,甚至只要能够提供出‘详细的材料’或新出的材料,也都是我们所一律欢迎的。任何研究,首先是占有尽可能接触的材料,其次是具体分析,再次是得出结论。只要是认真能够实事求是地做到这其中的任何一步都是有价值的工作。”^⑥1959年3月21日,郭沫若又说“研究历史当然要有史料……占有了史料,就必须辨别它的真假,查看它的年代,去其糟粕,取其精华,这一番检查的功夫,也就是所谓考据。”^⑦

在郭沫若看来,有一点特别重要,那就是史学家研究问题无论大小,只要对于揭示规律有利均属宝贵。他说“问题有大小,小问题乃至小小问题的解决,凡是对于规律的揭发有帮助,都是必要的。根据历史发展规律来改造社会,即有意识地创造人类历史,那更是史学的灵活运用了。”^⑧郭沫若说这番话是有背景的,随着50年代思想改造、批判运动的开展,那些关注小问题、精心考证史料的史学被边缘化,^⑨甚至被认为是违背科学观念的。^⑩郭沫若能提出这一主张,足见其态度。

1951年,《文史哲》创刊号发表了郑鹤声的《天王洪秀全状貌考》一文,引发了学术界的批评。1958年,山东大学的大字报就说它的“烦琐考证是反科学的”。^⑪而且这种批判研究细小问题的意见不是个别。^⑫在这样的学术氛围里,郭沫若撰文表示“有人考证洪秀全有没有胡子,这样的问题,当然不能认为是什么重要的问题。不过,如果有人要搞,我认为也可以由他搞去,这总比什么也不搞要

① 黄淳浩编《郭沫若书信集》下册,第245页。

② 郭沫若《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页。

③ 郭沫若《开展历史研究,迎接文化建设新高潮——为〈历史研究〉发刊而作》,《历史研究》1954年第1期。

④ 郭沫若《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3卷,第485—486页。

⑤ 郭沫若《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1卷,第4页。

⑥ 郭沫若《开展历史研究,迎接文化建设新高潮——为〈历史研究〉发刊而作》,《历史研究》1954年第1期。

⑦ 郭沫若《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3卷,第483页。

⑧ 黄淳浩编《郭沫若书信集》下册,第245页。

⑨ 参见蒋海升《从主流到边缘: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史料考订派》,《山东大学学报》2005年第6期。

⑩ 参见童书业《批判胡适的实验主义“史学”方法》,《文史哲》1955年第5期;李光璧《批判胡适反动实验主义的历史考据学》,《历史教学》1955年第9期。

⑪ 《历史科学中两条路线的斗争》(续辑),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7页。

⑫ 参见人民出版社1958年出版的《历史科学中两条路线的斗争》和1959年出版的《历史科学中两条路线的斗争》(续辑)。

强……当然,这种做法不能提倡,不能把很多的人力放在这些方面,要引导大家从大处着眼,把精力集中在大的事业上。”^①他的意思是,考证洪秀全有无胡须固然是小问题,但是不等于说没有价值,只不过不必提倡而已。这一观点实际是对琐碎考史的一种委婉的包容和支持。

无独有偶,1958年5月15日,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师生给郭沫若去信,请他谈谈“厚今薄古”问题,他写了回信,发表在6月10日《光明日报》和第7期《考古通讯》上,文中说道“资产阶级的史学家只偏重资料,我们对这样的人不求全责备,只要他有一技之长,我们可以采用他的长处……在史学研究方面,我们在不太长的时期内,就在资料占有上也要超过陈寅恪。这话我就当到陈寅恪的面也可以说。‘当仁不让于师’。陈寅恪办到的,我们掌握了马列主义的人为什么还办不到?”^②这个例子表明他不主张绝对反对细微考证,甚至内心深处流露对于陈寅恪那样占有史料的羡慕和向往。在舆论普遍推崇理论甚于史料的形势下,他能说出这样的话,足见其勇气。

以上表明,在理论层面郭沫若一方面提倡重视理论,另一方面又主张重视史料。实践上又是怎样一种情况呢?

这一时期,郭沫若自己在做《管子》的文献整理工作,就无法不考史。《管子》乃战国、秦汉时代文字总汇,是有关哲学史、经学史之资料。因为古写本不可复见,传世刻本简篇错乱,文字夺误,故以难读著称。如不加以整理,殊为可惜。最初许维遹以戴望《管子校正》为底本作《管子校释》,未成而逝;闻一多接着往下作,未精被杀。郭沫若接过这一工作,首先整补书稿缺漏之处,补录征引旧说未全者,然后誊录书稿,分由许、闻之旧友冯友兰、余冠英、孙毓棠、范宁、马汉麟等人校阅,最后由郭沫若总校,并加案语。为完成这一工作,郭沫若不得不四处调阅各种版本。北京、上海、长沙、武汉各地图书馆藏书或学者私藏都予以协助。他搜集到从宋杨忱本到明葛鼎《管韩合刻》本共17个本子。其征引的解读《管子》的文献,从朱熹《仪礼经传通解》到马元材《管子轻重篇新论》等达43种之多。^③对此,郭沫若深有感触,他在1954年9月26日写的《叙录》里说“欲研究中国古史,非先事资料之整理,即无从下手。”^④

此外,从其书信中也能看出郭沫若在史论关系上的倾向。1951年1月5日,郭沫若给王静如去信,表彰《史学集刊》上的王文“收集了不少的资料,值得钦佩”。^⑤同年5月31日,他给张汝舟写信,论《易经》成书甚晚,其理由是阴阳相推而生变化这种思想,殷周古器物铭刻及其他文献中无此痕迹,八卦于古器物、古文献中亦不见其痕迹。他说“这是我理论的出发点。”^⑥1955年10月12日,《历史研究》编辑部请他审阅林寿晋的《东晋南北朝时期的矿冶铸造业》一文。10月14日,郭沫若给《历史研究》编辑部去信道“这篇文章注意到新的研究方面,虽然主要是资料的搜集,但已难得,我同意备用。”^⑦这几例足以说明,50年代郭沫若为刊物审稿或评价史学论文,衡量论文水平高低时很看重材料,他自己的具体历史认识也还是以史料为依据,而不是以空洞的理论为尺度。

① 郭沫若《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3卷,第485页。

② 郭沫若《关于厚今薄古问题——答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师生的一封信》,《考古通讯》1958年第7期。

③ 郭沫若在《〈管子集校〉引用校释书目提要》中,明言为42种,《提要》补记表明,得杨树达提供的王先谦《管子校正》,对王氏高足苏舆、陈毅所增补之案语,择优入录。故言郭沫若征引解读文献43种。

④ 郭沫若《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5卷,第18页。

⑤ 黄淳浩编《郭沫若书信集》下册,第10页。

⑥ 黄淳浩编《郭沫若书信集》下册,第21页。

⑦ 黄淳浩编《郭沫若书信集》下册,第56页。

需进一步拷问的是,如何看待学术界批判考证学呢?郭沫若解答道“我们反对的是为考据而考据,以史料代替史学。”他笔锋一转又说“如有少数人一定要那样作,我认为也可以由他去,因为这总比‘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要好一些。”^①可见,郭沫若要表达的是,历史研究最好是以唯物史观作指导,史学家不这样做而只是考史,那也无妨。

郭沫若说“历史的范围很广,懂得一些正确的方法,必要的是要占有大量的资料。资料的搜集、整理、分析等是必须尽力地艰苦工作,丝毫也不能偷巧。尽可能占有第一手资料,迫不得已时,有批判地接受第二手资料。在这儿最要实事求是,就是要老老实实地下苦工。”^②他还说“固然,史料不能代替历史学,但在历史研究中,只有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原理而没有史料,那是空洞无物的……没有史料是不能研究历史的。因而,对搜集、考察史料的工作,不能一概加以否定。”^③

他的这些主张恰好成为 20 世纪 60 年代初史学界纠偏的先声。^④1961 年 5 月 25 日,郭沫若作《武则天生在广元的根据》,提出“我们要以批判的态度来从事史料的鉴别和使用。”^⑤1962 年 7 月 31 日,他给《四川日报》编辑部写信,强调“无批判地肯定一切与无批判地否定一切,都不符合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⑥就像 60 年代初翦伯赞等人就史与论关系展开纠偏一样,这两例又成为郭沫若纠偏主张的具体表述。

总之,郭沫若在 20 世纪 50 年代强调保持史与论之间要保持平衡关系,这不仅在其关于史论关系的论说中呈现出来,并且在其史学实践中也有所体现。他与翦伯赞等其他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一道,为 60 年代在史与论关系上的纠偏做了准备工作;同时表明其对于不同史学范式有包容之心,对马克思主义史学有自信之心,这就给人们认识当前史学形势,尤其为建立历史学的中国话语体系提供了一个宽广的视角和有益的参考。

(作者李勇,淮北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历史文化旅游学院教授;邮编:235000)

(责任编辑:敖凯)

(责任校对:尹媛萍)

① 郭沫若《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 3 卷,第 486 页。

② 黄淳浩编《郭沫若书信集》下册,第 245 页。

③ 郭沫若《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 3 卷,第 486 页。

④ 关于 60 年代初大陆史学界纠偏情况,参见王学典《二十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主潮》,山东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

⑤ 郭沫若《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 3 卷,第 508—509 页。

⑥ 郭沫若《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 3 卷,第 553 页。

SUMMARY OF ARTICL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istory and Theory in Guo Moruo's View on Historiography in the 1950s // Li Yong

In the 1950s, historians in mainland China criticized the experimental method in historical studies while committing themselves to the studies of Marxist historical materialism. This made the tension between experimentalism and Marxist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n Guo Moruo's view on historiography become more prominent. In theory, Guo advocated Marxism as the guide. In practice, he insisted on evaluating the quality of historical works based on the use of historical materials. His exposition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istory and theory was the harbinger of corrective actions in the historical circle in the early 1960s.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Theor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eaven and Man in the Pre-Qin Period: From the Mandate of Heaven, the Way of Heaven to the Way of Nature // Qu Bingrui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eaven and man is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pre-Qin historical theories.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eaven and ma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s own destiny and the unpredictable providence,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dividual existence and nature are the fundamental reasons for the emergence of pre-Qin historical theories. The content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eaven and man includes how to understand the material or blood relationship between heaven and human beings, how to underst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stronomical and astrological movements and the operation of the world, and how to grasp the life of human beings to establish a connection with heaven.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people's abstract think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eaven and man has evolved into an important variant, namel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ture, and the latter, to be more precise, is the elements of nature such as yin yang, and five elements. Therefore, theories such as the Mandate of Heaven, the Way of Heaven, and the Way of Nature gradually came into being, and they interacted, influenced, and intermingled with each other and coexisted in the social consciousness of the pre-Qin Period.

Writers of Family Rituals in the Song Dynasty // Lu Minzhen

"Family rituals" is a term known to the public. However, when it is used as an analytical category, the familiar facts about family rituals contain complexities that are not fully understood. In the process of making the texts of family rituals in the Song dynasty, the writers were often not just the makers and the observers of rituals, but the coexistence of multiple roles. Instead of hiding under the rules of rites, they marked their positions, attitudes, and even emotions in writing. They arranged each performer's actions, and then shaped each action in the ceremony into a type of performance, turning it into a repeatable event. When writers were actively involved in the production of meaning systems and various symbolic signs, they also put forward many thoughts on the boundary between kinship and gender issues.